

“文景之治”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治世，在历史上有着重要位置。在这个治世的缔造过程中，除了文景二帝自身的才能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批杰出人物的涌现，这些人为文景之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日，市三中教师张颂华做客国学讲座，为大家讲述——

“文景”名臣的悲喜人生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黄沫

公元前180年，立国才二十余年的西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在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才两个月，她苦心维护的吕氏家族被一网打尽，遭遇了灭族的惨剧。

随之，一个23岁的青年王爷被忠于刘氏的大臣们推上皇位，成为西汉王朝第三位皇帝。这个大臣们印象中柔弱恭谨的“弱势”王爷，在登基后迅速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华，和他的儿子景帝刘启通过勤政爱民、躬修节俭、重用人才，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海内殷富、百姓守法的治世时代——“文景之治”。在这个治世的缔造过程中，除了文景二帝自身的才能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批杰出人物的涌现，这些人为文景之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日，市三中教师张颂华做客国学讲座，为大家讲述两位“文景”名臣的悲喜人生。



张颂华

A 割地定制、列侯之国、重农抑商、礼治天下，贾谊四副“药”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奠定基础

被称为“洛阳才子”的贾谊少有才名，18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成为大汉帝国的“网红”。

河南郡都守吴公听闻贾谊的才名后，将其延揽至身边，协助自己处理政事，这给了贾谊一个深入基层、学习历练的机会。贾谊也没有辜负吴公的期望，在吴公身边的三年多时间，他扎实勤奋、殚精竭虑，在秉烛夜读、狠抓学问的同时，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完成了人生路上的凤凰涅槃。

贾谊21岁时，其老师吴公因为治地方成效卓著，成为朝廷最高的司法长官。吴公到长安就任之后不久，立刻向汉文帝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贾谊。正欲改弦更张、有所作为的汉文帝立马宣布征召贾谊入京，任职博士。汉文帝被贾谊的才华所折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当中，将贾谊连升五级，提拔到了太中大夫的位置。

文帝对贾谊的欣赏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贾谊就像一位良医，为各种沉疴缠身的汉王朝把脉诊治，在分析病因之后拿出了治疗方案。

当时的汉朝创立才20多年，制度还很不健全；藩王林立，皇权不振；诸侯满朝，霸占要津；商人横行，粮食减产；礼仪不全，人无秩序。这些事关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有人看到了，但是不敢说；有人能做到，但是不愿做；大家都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只求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工资。但贾谊不一样，他看到了就必须说出来。

针对当时的国情，贾谊开出了四副“药方”，割地定制、列侯之国、重农抑商、礼治天下。

贾谊最先提出的是礼治天下。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虽然第一个重要主张

受当时政治条件的局限，没有付诸实施，但并不代表主张的不正确，相反，汉文帝是很欣赏贾谊的主张的。

第二副“药方”直指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在贾谊流传后世的那篇著名的《治安策》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主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他们是亲还是疏，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照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二是定地制即“割地定制”，就是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第三副“药方”是重农抑商。文帝二年，贾谊上《论积贮疏》。这篇文章体现了贾谊强烈的重农抑商思想，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其中的主要观点用白话文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弃农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吃饭的人多而种田的人少，将来粮食从哪里来？”“平时不积累粮食和财富，灾荒、打仗时什么办？”“多积累钱粮，是富安天下的根本。”

第四副“药方”是列侯之国。所谓的列侯之国就是有爵位的功臣统回到封地。这个观点一出，可以说是掀起了政坛上的惊涛骇浪，让贾谊成为了众矢之的。

虽然，他的主张在文帝的心中是无比正确的，但是作为人君的汉文帝有一点很清楚，他是由元老重臣们选定并拥立的，并非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在初登大宝，皇位尚未完全巩固之时，就贸然开罪整个功臣集团，十分不明智。于是，贾谊被贬到了蛮荒的南方，担任长沙王的老师。

B 聪明机智、敢言善谏、工于心计，袁盎奠定了汉初的儒家治国理念

在历史上，袁盎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然而，张颂华却认为，袁盎聪明机智，敢言善谏；广结人缘，有侠义之风；工于心计，私德有亏。

袁盎的聪明机智很早就表现出来。早期虽投靠吕氏，却没有因为吕氏的倒台而遭受负面影响。在汉文帝当政时期，袁盎在哥哥袁哙的推荐下，顺利谋取了一个朝廷的官职。再次步入政坛的袁盎很快通过几件事情，确立了自己敢言、善谏的正面形象。

第一件事就是著名的“枉席无辩”的故事。文帝刘恒非常宠爱慎夫人，在宫中经常与皇后同席而坐。前178年的一天，文帝带着皇后、慎夫人来到郎官府衙（袁盎的办公地点），慎夫人正准备就坐，袁盎走过来，把慎夫人的坐席挪到了下位。慎夫人和刘恒羞愧之下，起身就要回宫。袁盎紧走几步，凑上前对刘恒说，我听说“尊卑有序，上下和睦”，现在，陛下既然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主人同席而坐呢！如果陛下真的宠爱慎夫人，就给她丰厚的赏赐；而陛下现在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令慎夫人带来灾祸。刘恒说，为什么这么说？袁盎说，陛下难道忘了“人彘”的悲剧吗！此言一出，刘恒心里一惊，感觉袁盎说的有理，于是把慎夫人请过来，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袁盎以“人彘”事件收官，正击中刘恒和慎夫人的软肋，让看起来是一次高风险的劝谏，在有惊无险中圆满收官，真可谓既勇且智。

如果说前一件事体现的是袁盎的敢言，那么预言淮南王刘长的命运，则充分展现了袁盎高超的劝谏艺术和敏锐的洞察力。

淮南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他力气大、胆子大，为人很是跋扈，目无法纪，仗着皇帝的宽纵，啥事都敢干，他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堂

辟阳侯直接打死，而不被治罪，使得朝廷上下上至太后和太子，下至列位大臣都惧怕他。袁盎当时就建议汉文帝压制一下，汉文帝没有听从。当刘长因为谋反案受到牵连、发配四川的时候，袁盎又对着皇帝大胆预言，刘长过刚易折，很可能死在路上，结果不幸言中。后来民间就出现了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这让汉文帝苦恼不已，因为他背上了手足相残的恶名，紧接着，袁盎又拿出解决方案，袁盎以文帝“高世行三者”力证文帝孝、勇、谦让，百姓绝不会诋毁他，再献策厚待淮南王三子，文帝果然不再烦心。所谓能干的臣子要能帮君王解决事情，袁盎的进谏艺术可见一斑。袁盎准确地考虑到文帝的顾虑，才完美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帝的心病，帮助汉文帝把责任撇清。此事过后，一时间，袁盎名声大震。

还有一件事，足以显现袁盎的城府。

赵谈是文帝最宠幸的宦官头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袁盎不对付，经常说些对袁盎不利的话。有一天，袁盎看到赵谈和文帝同乘一辆马车上朝，他拦住马车对文帝讲：“皇上，我听说能和您一起坐在乘舆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啊，如今大汉虽然缺乏英雄豪杰，可是陛下现在怎么和一个太监坐在一起呢？”

结果，文帝就让赵谈下车了，这让赵谈颜面尽失。更关键的是，公开闹了这么一出后，赵谈以后只要一说对袁盎不利的话，文帝就认为赵谈是在记仇，泻私愤，根本就不相信了，在碰了钉子后，赵谈再不敢在文帝面前说袁盎的坏话了。

袁盎为人敢言直谏，有较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劝谏文帝维持帝王的威严、拉退慎夫人的坐席、阻止宦官和文帝同车而乘等都是礼治思想的体现，奠定了汉初的儒家治国理念，成为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先声。

 船山故里国学飘香
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

国学教育

亲其师，信其道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

——习近平2019年3月1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

“亲其师，信其道”，出自西汉员、学者、礼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学记》，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著作。原文为：“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一语道破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重要影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历史表明，只有注重培养人才，才能确保后继有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问题，以高远的历史站位、宽广的国际视野、深邃的战略眼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为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指明了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广大思政课教师寄予殷切期望。

得人才者得天下。正所谓，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换句话说，人才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今天，无论是实现“中国梦”，还是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然而，人才应该是有一定标准的。古人云：“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今人说：“有德无才是庸才，有才无德是歪才，有德有才是人才。”我们需要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实践证

要的人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人才，不会从天而降，需要用心培养。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一个政党能否通人和，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都与人才队伍建设密切相关。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唐宋文学家韩愈在《师说》开篇写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都与老师的教育教导有关。今日世界，竞争尤为激烈。各类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常言道，严师出高徒。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说：“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要使中华民族人才辈出，首先要持之以恒、卓有成效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列之道”，给学生心灵播下积极向上的种子，为学生成才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程颐虽然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但次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实践证

明，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才能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就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教师，不但要以丰富的知识教育学生、以深厚的理念功底赢得学生，而且要具备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品德感染学生，做学生喜爱的人、亲近的人。

1000多年前，宋代理学家游酢、杨时，为了找洛阳著名学者程颐拜师求学，冒着严寒，从福建前往河南，置风侵雪打于不顾，在“程门”前站立了很长时间，直到积雪达一尺之厚。游、杨二人尊师重道、诚心求学的精神和举止，令人敬佩。但话又说回来，倘若不是因为程颐，游、杨二人或许不会千里迢迢拜师。据史料记载，程颐年轻时在太学一举成名，20余岁就开始接纳门生，教授儒学。后来，与其兄程颢一道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纷纷拜师于其门下。程颐修养有道，德才兼备。司马光等人在推荐书中写道：河南隐逸之士程颐，博学好古，安于贫贱，恪守节操，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希望朝廷让他出来做官，委以重任。程颐虽然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但次

年入京，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其操守之可贵、学识之渊博，由此可见一斑。众学生追随，也是情理之中。

都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教师，只有做到“德学”兼备、两者皆高，才能赢得学生由衷的敬佩与尊重。这就要求教师要加强学习、注重研修，不断给自己注入“新水”、“活水”。才可望成为一个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教师，如若忽视学习，得过且过，放任自己，必定会误人子弟。当下少数教师经常连备课程都省去了，授课照本宣科，毫无感染力，缺乏启迪性……如此这般，怎样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又怎么能“亲其师，信其道”？

教育家夏丏尊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时至今日，这段话依然发人深省。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灵魂的塑造者。一方面，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学生的观察与检验中。大量事实表明，唯有知识渊博、道德高尚、行为规范、忠于职守的教师，才能赢得学生，值得学生追随。

(据人民网)

谭鑫振：

知足是人生一乐 无私得天地自然

谭鑫振（1843—1882年），字丽生、贡三，清衡山县（今衡东县石湾镇泉水村）人。他自幼聪慧，才智过人，刻苦学习，以高材生见赏于授业老师。弱冠中秀才，名列前茅，但为人极为谦虚，因而负笈上进，后就读于衡州石鼓书院。同治九年（1870年），考中举人，署岳州训导，湖南巡抚王文韶对他很重视，将其视之为“国器”，委其校阅各书院的经课。

谭鑫振一边工作，一边系统地自学经史和百家著述，并留心时事。光绪六年（1880年）赴京，殿试得一甲第三名（探花），任翰林院编修。点探花后，他并不急于做官，请假回家省亲。游南岳时撰写《半山亭记》，亲自用大楷书写，刻碑留为纪念，曾广泛为人拓印，以供临摹。游罢南岳，回家休息，正值鹤岭的东岳庙落成，他应邀提笔写了“紫气东来”四个大字的匾额，悬挂在庙门首。大字气势非凡，独具一格，来往行人无不称赞。百

多年来，他的书法一直受到珍视，他的名字已列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谭鑫振眷恋故乡山水人物，但因假期届满，几个月便北上。

回京后，他奉命到浙江任职，很想有所作为，为百姓办些好事，但事与愿违。不久，被调到山海关任职，但不忘初心，仍想在自己的职守内，多做些有益于国于民的事。他经常微服私访，深入了解民间疾苦，打击为非作歹的豪绅，百姓无不称好。但后来，他重病缠身，还没来得及一展壮志，在光绪八年（1882年）殁于山海关任上，英年39岁。

谭鑫振临终的遗言：“知足是人生一乐，无私得天地自然。”

（记者胡建军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衡阳历史文化
小辞典 人物系列 51

用典释义

大臣不廉 小臣必污

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祸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

——《御定人臣儆心录》
(清·王永吉)

■译文

大臣如果不廉洁，不能下属作出表率，下级官员必然会腐败。下级官员不廉洁，就不能有效地治理地方，社会风气必然遭到破坏。层层官吏都如此追逐私利，贪欲无止境，祸害的必然是百姓，但是遗患在国家内部。希望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

■解读

王永吉，字修之，明末清初江南高邮人，历任大理寺卿、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尚书，为官清正廉洁，著有清朝顺治帝钦定的《御定人臣儆心录》。本段对“大臣不廉”与

吏治腐败的必然关系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强调了上行下效的重要性。

古人云：“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因为大臣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他们的居官任事，影响一个系统、一个区域的政风行风和政治生态，对社会风气产生重大的影响。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是一个“大臣不廉”的例子，他依仗乾隆帝的宠幸，大肆敛财。国泰、陈辉等一大批官员纷纷投靠和珅门下，与其狼狈为奸，贪得财物动辄数百万之多。和珅在朝二十多年，朝廷之正气尽丧于他之手。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充分说明了大臣廉洁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吏治风气。

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培育清正廉洁的风气需要领导者率先垂范，其效果就像响之应声一样显著。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场合多次喊话“关键少数”：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如此，通过不懈努力，方能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据人民网)

图书推荐

另一种“唐诗三百首”

皇朝《全唐诗》近五万首，蔚为大观。中国人最熟悉的选本莫过于清朝蘅塘退士编选的风行二百多年的《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口碑极好，是唐诗启蒙当之无愧的首选。可是，且不论任何一种选本本身都会有局限性，就其后果——大多数中国人只知有《唐诗三百首》，不知《全唐诗》为何物而言，也有挂一漏万、罔顾其他唐诗之美的遗憾。基于此，古典诗词鉴赏名家李元洛先生以现代人的立场、观念与眼光，选取与《唐诗三百首》无一重复的337首唐诗，分成自然、社会、人生、艺术四类，下设“时空”“环保”“农事”“工商”等28小类，加以悉心品赏，遂成《唐诗分类品赏